香港青年内地创业系列之一

既有专业素养 又具融入意识

港青北上感受“被需要”

本报记者 **张 盼**

9年前，剑桥大学毕业归港的曹肇棆，在凌晨结束美林证券的工作，回到家打开电视，满眼都是迷你仓的广告。持续数小时的“霸屏”播放，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而今，记者面前的曹肇棆，已是“CBD迷你仓”的创始人。自称“新北京人”的他，慢条斯理地讲述着告别金融人身份，历经数年实现创业梦想的故事。

像曹肇棆一样北上创业的香港青年还有很多。仅以香港专业人士（北京）协会创新工商委员会为例，便已有100名在京创业的港青委员。创新委主席何善恒向记者介绍，创业不仅限于“高大上”的科技和金融领域，在京创业的港青来自各行各业。除了“站在风口上”的领域，还有主打港式特色的创业选择，比如卖奶茶的“香港冰室”，卖广东汤的“一碗靓汤”等。

每周在全国打“飞的”

高中起便在美国硅谷读书的港青何善恒，如今是“WE+”联合办公空间的联合创始人，其创业首站是位于北京酒仙桥798艺术区的联合办公空间。它在一座办公楼的2层，约3500平方米的场地内，共有18家中小型企业入驻。在带领记者参观时，他指点空间内随处可见的油画、雕塑、装置艺术，言谈间难掩兴奋，“有些是从798回收来的展品，有些是我自己的收藏品，还会邀请美术学院的学生展示作品。”

“以画廊的形式打造联合办公空间，不是复制外国的模式，是我拍脑门想出来的，很可能是世界第一家。基于文化艺术的联合办公，我们也是全国覆盖率最大的。”何善恒说。

“联合办公，这也是最近才有的概念。”何善恒调侃道，“以前别人问起，我就说自己开画廊，要么说是‘二房东’。”3年前他推出自己的首个联合办公空间时，毛大庆还没创办优客工场，潘石屹的SOHO众创空间也未落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更多人关注到服务型办公空间，地产大佬在做相关工作，也带动了市场气氛。”

“香港的自助仓储行业多年前已经起步，如今市场相对饱和。反观内地，大量市场还处在空白阶段。”在曹肇棆看来，北京等一线城市与香港的市场情况极为相似，具备土地价格高、小户型住房走俏、人口流动性大等发展迷你仓的条件，便在北京的核心商务区及大型居民社区等处，盘活闲置的地下空间，并通过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服务提升用户体验。

“玩在未来”是国内知名舞台剧公司“至乐汇”旗下的品牌，其联合创始人、香港导演叶逊谦已在戏剧教育领域深耕多年。据他介绍，香港戏剧教育上世纪70年代便已萌芽，如今比较成熟，单是自己组建的剧团便已与当地200所中小学合作过。“来内地后发现需要从零开始，每周在全国打‘飞的’，足迹基本遍及各大省份，有种被需要的感觉，让人很是感动。”

内地已具备创业生态圈

“很多人渴望成为北京的一分子，因为这里是首都，近似于梦想之都。总觉得在北京能成功，在内地其他地方应该也有机会成功。”何善恒说。

“内地已经具备了创业生态圈，像亚马逊森林一样，什么都有。生态圈成立才能产生很多机会，这里已经比较成熟。不管在创业的哪个阶段，都能找到导师或朋友。而香港还处在垦荒阶段。”移动支付公司“钱方·好近”创始人兼CEO李英豪，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信息工程系，居港工作3年后，选择北上创业。

李英豪对记者说，香港的创业环境近两年虽比以前好，但依旧不够理想。“创业需要足够大的市场，但香港的市场不够大，而且各类成本较高。以前创业被港人视作冒险，不是常人会做的事情。现在大家开始认可创业，愿意去尝试，但眼界还是有局限。香港的创业公司，有些还处在比较早期的阶段。”

前段时间，香港特区政府大力支持创新科技发展，香港科学园也为当地创业者提供帮助。但李英豪认为，特区政府的各项扶持措施，虽有帮助，却难起到实质作用。“问题核心是港人创业创新意识不够，年轻人冲劲不足。”若想开辟内地或国外市场，绝大部分港青又缺少长期在那里生活体验的机会，怎么能做出“接地气”的产品呢？

“香港社会有很多限制，发展传统产业成本较高，很难搞起来；做创新型企业又面临市场小的问题，而且当地人才按回报率流动，大多往金融行业走。”曹肇棆说，近两年人才流动的趋势在美国和中国内地有所改变，美国名校人才由选择投行，转为部分首选去硅谷创立科技公司。内地创业环境日渐完善，选择创业的也大有人在。“近来香港社会不太和谐，流动性机会欠缺，年轻人难以通过改变突出重围，无论就业或是创业都是如此。”

要够专业，也要够融入

何善恒最近参加某内地创业营，遇见一名内地营员。其前往香港创业，成功打造天猫上首屈一指的美妆品牌，一年的化妆品销售额达上亿元。对方称赞所在团队中的香港青年是公司几百号员工中最优秀的，吃苦耐劳，专业过硬。这让何善恒大为感慨。

何善恒说，香港重视专业性培训，致力于打造各行业专业人才。“专业能力和态度上没问题，但有些人可能缺乏对内地的了解。”内地尤其是北京竞争很激烈，想要立足并不容易。香港青年的视野相对局限在当地，感觉来内地工作的不确定性大。“其实水平较高的人都会觉悟到，要借助香港这座城市的优势，放眼国内、寻求发展。”

回望香港，何善恒认为，那里处在世代交替之际，企业中正经历新老的换代。如果父辈来过内地发展，后辈受其影响，选择北上的几率也较高。如果未曾涉足内地，眼光就会局限在香港。“我相信未来能在香港立足的企业，肯定跟内地有连接。当这种企业发展起来时，香港的年轻人会有更多机会，但需要了解如何跟内地融合。”何善恒说。

据何善恒介绍，很多港人有家乡情结，100名创新委成员里，已婚者约有一半，其孩子大多在香港。很多时候在内地创业，很少考虑回去，对香港的发展变化未必了解，想要回香港发展或拓展市场，都可能需要帮助。“创新委也希望帮助在京成员了解香港创业的情况，介绍香港科学园等方面的扶持政策。”

“如果你都不觉得自己是北京人，怎么能融入？你不爱这块土地，它也不会爱你。而爱的表现就是融入。”何善恒说。而他的好友曹肇棆，如今除了谈起内地知名企业家来头头是道，还不时引用曾国藩处世名言和内地网络段子，京腔更是在“港式普通话”中依稀可辨。

中央赠澳大熊猫产下双胞胎

6月27日，澳门特区民政总署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央赠澳大熊猫“心心”及新生宝宝的健康情况。初步确认，“心心”26日产下的双胞胎都是雄性宝宝。

新华社发

内地香港警方联手打掉12个偷渡团伙

新华社深圳6月27日电 今年2月公安部部署广东、广西、云南、新疆四省区公安机关联合香港警方开展打击粤港边界偷渡活动行动以来，截至6月26日，内地四省区已破获偷渡香港案件205起2100人，抓获境内外组织、运送者218人，打掉跨境、跨区域组织偷渡团伙12个。

内地公安机关与香港警方6月27日在广东深圳联合召开的粤港边界打击偷渡行动第三次工作会议通报了上述情况。其中，仅广东公安边防总队联合香港警方破获的两起重特大偷渡香港的案件，就在粤港两地抓获组织、运送者46人，东南亚和南亚籍偷渡人员154人。

据介绍，行动开展以来，内地公安机关与港方开展了密集、务实的交流合作，在情报交流、案件侦办、陆海管控、口岸查控等方面建立了工作机制，构建了联合防范、联合管控、联合打击的反偷渡工作格局，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战果。香港警方通报，港方截获的东南亚和南亚籍偷渡人员同比下降55%，案件高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会议同时指出，4个月的持续打击行动成效显著，但偷渡香港活动依然活跃，呈现出偷渡组织职业化、偷渡方式多样化、偷渡行为诡秘化，打击难度加大。打击行动稍有放松就会出现反弹回潮，必须进一步巩固合作成果、深化联合打击行动。双方商定，将进一步加强粤港、桂港警方的情报交流，强化源头管控、二线查控，清查遣返“三非”外国人，加大联合侦办案件力度，依法严打幕后组织者，坚决将偷渡香港活动的活跃势头压下去。

张志军会见南投县长林明溱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赵博**）中台办、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近日在京会见了南投县长林明溱一行。

张志军对林明溱一行来访表示欢迎。张志军表示，当前，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在于坚持“九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我们将继续推进两岸民间各领域的交流合作，继续为两岸民众谋福祉。

林明溱一行是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参加第三届冀台博览会后来到北京的，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交流。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俄声明有助认清南海“仲裁”真面目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记者**靳若城**）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7日表示，《中俄关于促进国际法的声明》中的立场正本清源，有助于国际社会认清某些国家自导自演的南海“仲裁”闹剧的真面目。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普京总统此次访华期间，中俄两国外长签署发表《中俄关于促进国际法的声明》。两国专门就国际法问题联合发表声明，这种做法并不常见。发表这个《声明》的背景是什么？是不是与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有关？

洪磊说，在当前国际秩序演变、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背景下，推动国际法治、追求公平正义已成为国际潮流。中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两大常任理事国，在维护和促进国际法方面负有共同责任。

他说，此次两国发表《中俄关于促进国际法的声明》，体现了两国对国际法的坚定承诺，彰显了两国继承、创新和发展国际法的积极作为，也表达了两国在和平解决争端等方面的共同关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洪磊说，关于和平解决争端，《声明》强调指出，“各国应本着合作精神，在国家同意的基础上善意使用争端解决方式和机制，不得滥用这些争端解决方式和机制而损害其宗旨”。关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声明》也强调指出，“不能破坏《公约》所建立的法律制度的完整性”。

洪磊表示，这些立场正本清源，有助于国际社会认清某些国家自导自演的南海“仲裁”闹剧的真面目。

中国南海研究院访日团近日在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记者会，就南海问题回答日本记者提问。

新华社记者 **马 平**摄

非洲媒体人士强调

美国无权干涉南海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潘洁**）多位非洲媒体人士近日在京参加第六届非洲数字电视发展论坛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南海有关争议应由直接当事方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和平解决，美国作为域外国家无权干涉。

《苏丹人报》记者默罕默德·阿卜杜勒阿齐兹指出，近年来南海问题的变热与美国幕后指使有关。他表示，直接当事国坐下来开展双边谈判磋商是解决南海问题的最好途径，西方国家等外部势力不应予以干预，否则只会火上浇油。

“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南海问题比寻求仲裁更好。当你身处万里之外，很难真正了解南海这个地区到底发生了什么。”喀麦隆国家电台主任马德莱娜·索皮·科托说。

冈比亚《标准报》记者马姆·萨伊特·塞赛说，已有充分历史证据表明，南海诸岛属于中国。“菲律宾之所以选择仲裁，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理亏，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寻求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帮助，通过国际仲裁来解决问题。然而，菲律宾单方面寻求仲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马姆·萨伊特·塞赛呼吁，美国作为域外国家不应干涉南海问题。他认为，东盟应积极推进南海争议当事国与中国展开磋商，尽快达成解决方案，共同维护好南海的和平稳定。他还称赞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展现出的理性、克制态度。

尼日利亚《太阳报》主编伊肯内·埃梅乌认为，域外国家派军舰到南海是一种不适当的干预。“世界上没有哪部法律或者双边多边条约支持以这种挑衅行为解决问题。相关争议应由当事方坐下来、面对面予以解决。”

在埃及《七日报》记者哈尼·默罕默德看来，目前南海局势稳定，船只航行无阻。但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却故意炒作南海问题，以支持他们的军事霸权行为。

“西方媒体在报道南海有关问题时犯了很多错误，发表的报道比较片面。”他说，希望中国媒体在国际舆论场多发声，推动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多国专家学者强烈质疑南海仲裁案

新华社记者 **刘 芳 甘 春**

来自亚洲、非洲及欧美国家的30多名国际法学者26日齐聚荷兰海牙，就南海仲裁案及其对国际法治的影响举行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对仲裁庭裁决的合法性提出普遍质疑，对强行推进南海仲裁给国际法治造成的伤害发出警告，呼吁国际法学界正确、全面、完整地理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约》），推动南海争端通过直接协商谈判这一更合理、更有效、对当事方和国际社会更有利的方式来解决。

所谓仲裁“诡异之处颇多”

在这场由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和荷兰莱顿大学格劳秀斯国际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研讨会上，美国国务院前法律顾问亚伯拉罕·索费尔指出，中国已按照《公约》规定将海域划界等争端排除强制仲裁，中国拒绝菲律宾将南海争端提交仲裁有坚实的法律依据，被强行推进至今的南海仲裁“极不明智”。

英国外交部前法律顾问克里斯·沃默斯利指出，仲裁庭未能在基于事实的客观基础上判断菲律宾诉求所掩盖的真实争端。他说：“海洋地物的地位与领土主权和海域划界密切相关，而仲裁庭没有认识到南海问题的根本性争议是主权问题，对南海海洋地物地位的判定，只有在相关主权问题解决后才可能给予合理的解答。”

台湾海洋大学海洋法律研究所教授高圣惕指出，南海仲裁“诡异之处颇多”，菲律宾精心包装的诉求看似单纯，实际上蕴含着极其险恶的用意，是以打压中方行使主权、伸张菲方主权主张为目标；而仲裁庭却装聋作哑，将明显不是《公约》适用、已被中方排除强制解决程序的争端送入实体审理阶段。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首席专家易显河指出，仲裁庭的管辖权裁决无视对中国有利的已有判例，荷兰籍仲裁员松斯和法国籍仲裁员科特不做解释就改变他们曾经发表过的对中国有利的观点，违背了国际法治中“法律一贯性”的重要原则。

强制仲裁对争端解决有害无益

曾任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主席的拉奥·佩马拉朱指出，菲律宾试图绕过中国政府2006年作出的将划界等争端排除强制仲裁程序的声明，要求仲裁庭就南海个别岛礁的海洋权利作出裁决。仲裁庭即便作出裁决，也仅仅是“真空中抽象的学术操练”，对南海争端的解决并无实际价值。

现年74岁的拉奥曾任国际刑事法院法官。他对记者说：“仲裁庭对主权和划界问题无权管辖，仅仅判断个别岛礁的海洋权利，就好比空谈一件物品到底是什么，却不能判断这件物品归谁所有，这样等于没有裁决。倘若仲裁员就该物品的归属作出判断，那又证明了他们越权。”

在高圣惕看来，菲方称将与中国争端的特定部分提呈司法解决有助于两国南海复杂争端的解决，这是在误导舆论。菲单方面强行提起的南海仲裁案不但不利于缓解南海冲突，反会加深两国人民间的误解，破坏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间的相互信任。

索费尔指出，菲律宾和美国指望通过强制仲裁改变中国立场“纯粹是妄想”。事实上，菲单方面提起强制仲裁，已迫使中方不得不采取更坚决的主权表态和主权行为。

莫让国际法治遭受重创

对于南海强制仲裁对国际法尤其是《公约》造成的严重伤害，索费尔深表担忧。他说，国际司法和仲裁机构本应尊重国际条约自身的限制和主权国家的保留，而仲裁庭却宣称对菲律宾“人为制造”的诉求拥有管辖权，这已破坏了国际司法和仲裁机构的可信度。南海仲裁的现实后果不仅严重侵犯有关各方的实际利益，甚至可能产生更糟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柳华文同样指出，整体和长远地看，不合实际、不符合国际法及其适用范围的事情，对所有国家都不利。他说，今天菲律宾单方针对中国滥诉，明天同样的强加于人就可能发生在其他国家间；今天仲裁庭作出不符合事实和法律的裁决，明天同样的错误就可能出现在其他的领土或海域纠纷中。

国际法院前法官阿卜杜勒·科罗马告诉记者，国家同意对强制性仲裁来说必不可少，《公约》的强制性仲裁及其他强制程序均应严格建立在国家同意基础上。科罗马是1973年至1982年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的非洲代表团团长，正是这一有160多个国家参与历经9年的会议最终产生了《公约》。他说，南海仲裁庭必须首先保证其管辖权不存在任何疑问，才能进入实体问题审理，否则裁决不可能有效。

协商谈判才是正道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中方所主张的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立场才是正道。索费尔以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边界争端解决过程为例，说明强制程序并不是解决争端的主要途径，更不是唯一和首选途径。他说，美国和加拿大自1812年战争以后存有10处边界争端，两国对过于复杂、牵涉太多因素的争端坚持通过协商解决。

索费尔说，美国过去不曾、将来也不会将类似菲律宾诉求的争端提交国际仲裁，但近期却反复要求中国遵守仲裁庭裁决、支持所谓“法治”。美国应回到中国所主张的正确轨道，敦促菲律宾返回谈判桌。

（**新华社海牙6月27日电**）